

卢卡奇的总体范畴及其存在论上的黑格尔主义方向

吴晓明

[复旦大学, 上海 200433]

关键词: 总体; 相互作用; 存在论; 黑格尔主义

摘要: 卢卡奇“总体”范畴的重要性在于, 它不仅构成对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的主要立脚点, 而且由之引申出对马克思哲学重新加以阐释的基本路向。虽说《历史与阶级意识》对总体范畴的解说主要被理解为方法论性质的, 但事实上该范畴正是将根本问题引向了存在论的深处。就此而言, 卢卡奇有其独特的理论成就与贡献, 但其总体范畴的存在论基础归根到底仍然是黑格尔主义的: “总体”的辩证法作为“最根本的相互作用”未能最终突破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 并且仍然滞留于范畴论路向的局限性之中。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 - 7511 (2005) 06 - 0012 - 04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 卢卡奇的“总体”(Totalitat) 范畴具有极端的重要性。这不仅是因为借助于这一范畴, 卢卡奇猛烈地袭击了“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 袭击了这一“正统”对马克思哲学阐释中的庸俗唯物主义和科学实证主义倾向, 而且试图藉此范畴来重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直接衔接”, 来恢复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的“革命性质”, 来构建这一哲学基础之内在的“能动方面”和“主观方面”, 并从而重新制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路向。然而, 虽说卢卡奇的“总体”范畴一再被提及和引用, 但它的根本性质——它在哲学基础上的性质, 更加确切些说, 它的存在论性质——却很少被批判地追究过。因此, 当卢卡奇借助于辩证法的总体范畴卓有成效地打击了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

并积极开启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路径时, 这个范畴本身却似乎仍然滞留于晦暗之中。

应当从何处来探究并把握其基本性质呢? 也许, 最为便捷且最为显明的方式莫过于从它的对方、从构成它的那个对立面开始。那么, 构成“总体”范畴之有所针对并力图使之克服的那个对立面是什么呢? 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 (Vorherrschaft)”。因为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正是将“总体”在方法论上的核心地位与经济的优先性对立起来: 把马克思主义同现代知性科学 (即“资产阶级科学”) 决定性地区别开来的东西, 不是经济的优先性, 而是“总体的观点”。前者——作为经济决定论——乃是知性科学化的一种基本样式; 而后者——作为对总体

收稿日期: 2005 - 03 - 17

作者简介: 吴晓明, 男,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范畴之统治地位 (Herrschaft) 的认可——乃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 (Trager)”。因此,从理论方面来看,甚至可以说,马克思学说的革命性质,首先表现为“总体”原则在马克思全部思想中一向占有“方法论的核心地位”;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全部庸俗性质,首先就表现为它以实证主义的“科学性”把总体范畴“打入冷宫”,从而阉割了作为马克思学说之根本的革命原则。^{[1](P15-16)}

在卢卡奇看来,所谓总体范畴,乃意味着“整体”对于各个部分之全面的和决定性的“统治地位”,它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这是一个具有原则高度的提法,它意味着:马克思创立的全新科学的“基础”乃在于方法,而这一方法的“本质”乃在于“总体范畴”。既然总体范畴是为基础的本质,亦即科学中革命原则的拱心石,既然这一本质直接地并且本源地出自黑格尔的辩证法,那么对于卢卡奇来说,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本质,就理所当然地要求通过“更新和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方法论”来加以实现。^{[1](P15-16,32)}

然而,如果更加精详也更加深入地考察起来,我们便不难发现,这里所牵扯到的作为方法论基础的总体性问题,既不是一个同第二国际理论家进行论战的策略问题,也不是一个局限于外在方法论范围内的方式问题。因为,如果这仅仅是一个外在的方法论的方式问题,那么,不要说梅林和普列汉诺夫,即使是第二国际的任何一个理论家,都不会予以否认的——他们完全能够而且肯定愿意在这个范围内承认辩证法及其总体概念。不仅如此,在这样的范围内,总体在方法论上的核心地位也就根本不可能与经济的优先性相对立,因为这种优先性是完全可以在总体范畴中(亦即在总体概念的范围内)获得确认的。

那么,这里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何以在这里会出现如此之大的理解偏差呢?

我们的回答是:在方法论的理解已被外在化、形式化和中性化之际,这里的问题实际上根本不是通常所谓的方法论问题,而是存在论问题,是存在论的根基问题——无论卢卡奇本人是否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而上述理解上的偏差之所以出现,就因为流俗的见解用已然无关于痛痒的方法论表述掩盖了至关重要也至为迫切的存在论根基问题。因为只要一谈到“对黑格尔遗产进行彻底唯物主义改造”,只要真正深入到“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这种决定性问题的前景”,那么存在论的根基问题便俨然以其自身的严重性绽露出来了。我们在这里的意思是说,当卢卡奇以这样一种方式提出所谓方法论问题时,关于方法乃是单纯形式的理解定向便完全丧失了它的有效性——这种理解定向的有效性无论如何至少是前黑格尔的。在黑格尔那里,例如,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当“实体即主体”被当做其存在论的基础来把握时,难道这一命题不同时就是其方法论原则么?难道这个序言乃至这部著作的全体不正是作为体系之“灵魂”(即方法)的展开与自行道说么?难道黑格尔所谓“现实的东西”——自己建立自己的东西,在自身中生活的东西,不就是“沉入于内容”的方法本身么?所有这一切,皆可在所谓“绝对方法”这一提法中得到突出之表现。而在对方法的这种理解中,方法就既不从属于“表象思维的习惯”,又不是以脱离内容为自由的“形式推理”,毋宁说,它就是“逻辑自身”——“因为方法不是别的,正是全体的结构之展示在它自己的纯粹本质性里”。^{[2](P30-32,4043)}在这种情况下,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任何一种脱离其存在论实质和内容的形式化或中立化理解都是不可能的,除非它已经先行地被抽象化曲解了。同样,当这种绝对方法有可能被切近地把握或真正地触动时,其本体论视域亦必已经先行地作为地平线被接受或被改变了。

因此,无论卢卡奇在当时是否充分地

意识到这一点,也无论他在问题的提法上是否存在什么策略考虑,《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存在论的基础问题。正是这一核心问题标示出这部著作之全部意义及重要性。因为这部著作已然显现出来的意义并不是表明纯粹形式的、外在的和中性的方法如何能够立足于自身,而是恰好相反,它揭示出一种切中于历史内容的方法论(在此即是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绝对必要性,并显现出这样的方法论如何不可避免地深入到并且触动到其存在论的根基处。否则的话,卢卡奇就根本不能够——甚至不能指望——去袭击“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历史与阶级意识》也根本不可能在20世纪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史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现在,我们应当进一步追问的是:卢卡奇的总体范畴在存在论的基础上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换句话说,这一范畴立足于怎样的存在论基础之上?如果说,所谓总体范畴一般地意味着辩证法及其整个地贯彻与实施,那么这个说法肯定是不错的;当卢卡奇进而把辩证法的核心问题提示为“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时,我们应当承认这一提法不仅切中肯綮而且具有原则高度。但是,当他把这种作为“总体”的辩证关系称之为“最根本的相互作用”^{[1](P50)}时,这就颇让人感到费解了。考虑到卢卡奇精通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这就更让人感到费解了:因为老黑格尔早就说过,“相互作用”还只是站在概念的门槛上。这种令人费解的情况看来是由“总体”的匿名状态造成的,亦即是同“总体”概念在存在论根基上之未经澄明的晦暗局面相联系的。卢卡奇想要否弃黑格尔的概念神话,亦即想要否弃主客之间辩证关系在黑格尔那里的概念形式(绝对者-上帝),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种否弃如果不是从存在论基础上形成的真正超越,那就只能成为一种姑息性的和降格以求的理解——而对于黑格尔哲

学的任何一种姑息性的和以降格的理解作基础的否弃图谋,最终都宿命般地逃脱不出它的巨大规范并不得不成为它的一个枝节或片断。诚然,卢卡奇也说过我们不能停留在相互作用这个范畴上,而要达于并深入于“总体”之中;但这个“总体”如果不能决定性地超出黑格尔哲学的一般性质,那么在缺失或去除概念形式的情况下就只能是“相互作用”。更加准确地说来,只要这种“相互作用”仍然仅仅被置放在概念形式中,那么它就仍然是黑格尔主义的。然而,在以非概念方式来把握“总体”的可能性还根本没有作为存在论革命的前进运动得到真正把握之前,“相互作用”的理解方式说到底只能是退化性质的。事实上,卢卡奇在引证马克思的两段话并以此指证对黑格尔哲学的决定性超越时,他不过是在援引“相互作用”。其中的一则出自《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3](P11)}对于另一段出自《博士论文》的引文,卢卡奇这样评论道:“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里,比黑格尔更具体、更坚决地实现了从存在问题及其意义的层次问题向历史的现实的领域,向具体的实践的领域的过渡。”^{[1](P199)}

这是一种错估,并且它不是一般思想史意义上的错估,而是一种就问题本身之性质上的错估。因为事实上马克思的这篇论文还完全处在黑格尔哲学的基本规范之下,其特点是强调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康德-费希特因素,并且为谋克服分裂计,诉诸缺失概念形式的“相互作用”。而卢卡奇的这种错估本身表明,他试图超越全部形而上学以揭示马克思哲学之性质与意义的努力,终于还是一般地落到了黑格尔哲学的基地上。“相互作用”——尽管这是“最根本的相互作用”——只是使“总体”成为匿名的绝对者,而匿名的总体归根到底不能不指向去除了黑格尔名号的黑格尔主义理解基地。所以,卢卡奇本人在1967年

为《历史与阶级意识》所撰之新版序言的陈述乃是真确的：“我一直是根据我自己的黑格尔主义的解释来阅读马克思的”；该著对异化问题的实际讨论方式，“是用纯粹黑格尔的精神进行的”；更加重要的是，这部著作的“最终哲学基础是在历史过程中自我实现的同一的主体 - 客体”；至于该著对此“同一”本身的变更，亦即将《精神现象学》的逻辑 - 形而上学结构实现在所谓无产阶级的存在和意识中一事，则是一种“想比黑格尔更加黑格尔的尝试”。^{[1](P34,17-18)}

不难看出，这里所谓的“最终哲学基础”，正是就存在论的根基而言的；所谓“比黑格尔更加黑格尔的尝试”，乃是指黑格尔哲学的费希特因素（“自我意识”因素）的扩张与充盈。关于前一个方面，我们可以说，黑格尔的“在历史过程中自我实现的同一的主体 - 客体”，就其根本性质来说，乃是在现代形而上学的范围内解决形而上学所造成的全部二元对立之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尝试。正因为如此，所以卢卡奇的批判——无论是对现代性的哲学批判还是社会批判——能够超出或对立与“梅林 - 普列汉诺夫正统”；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卢卡奇的批判仍然被封闭在现代性以之作为前提的存在论根基处。关于后一个方面，我们看到，由于重返黑格尔主义的基地，又由于从该基地出发而同“庸俗马克思主义”作战——同情性的“物质实体”作战，同机械论的宿命论和无批判的科学实证主义作战，所以，“自我意识”的一端（当然是作为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即“阶级意识”）便以一种激进的费希特主义的方式发展起来并扩张开来。^{[1](P127-129)}

诚然，卢卡奇还是一般地谈到了黑格尔哲学的“概念神话”，谈到了黑格尔的“变得抽象的、直观的方法”歪曲和糟蹋了历史，并且还——这确实又是卓有见地的——谈到黑格尔使思维重又落入主体和客体的“直观二元论”中，并且使概念重又获得了一种“康德唯心主义的意

义”。^{[1](P226-227)}这一存在论的见地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它确实抓住了形而上学的根本，并且烛照了作为柏拉图主义的现代完成、即作为“形而上学之一切”的黑格尔哲学的隐幽本质。然而，谈到或看到问题与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并不是一回事，就像我们判断一个人并不是根据他所说的而是根据他实际所做的一样。在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方面，卢卡奇的那种几乎可以被称之为悲剧性的薄弱之处就在于：他所认识到的局限性是他无力纠正的，而他已经指证出来的那些根本对立也是他无法以超出黑格尔的方式来扬弃的。在这种情况下，滞留于或者复归于形而上学的神话学——虽则黑格尔哲学乃是此种神话学之最高成果——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因此，《历史与阶级意识》在存在论根基方面的限度在于：它不能（或无能）决定性地超出黑格尔哲学的一般性质，从而其“最终哲学基础”不能不是黑格尔主义的——这意味着它超不出一般“哲学”或一般形而上学的基本性质；而这种态势又决定着卢卡奇对马克思哲学的富有成果和意义的解释仍然从根基上被锁闭在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中。

因此，卢卡奇在1967年坦率承认《历史与阶级意识》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定向乃是黑格尔主义的。不管卢卡奇在哲学上发生了何种转变，他对此一定向之性质的确认却一点也没有说错。正是由于这种定向，所以和普列汉诺夫对于马克思“实践”原则的费尔巴哈式的理解相对立，卢卡奇在那里构建了一种“抽象的、唯心主义的实践概念”，并由此而“重新陷入唯心主义的直观之中”。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实践概念表现为一种“夸张的高调”，并且接近于当时流行的“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1](P12-13)}那么不难看出，在与梅林 - 普列汉诺夫正统的对立中，这里得到特别发挥的内容在存在论的基础方面乃是黑格尔主义的，尤其是（下转第20页）

解和阐释马克思哲学终结或超越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在内的一切形而上学的哲学革命的话,那么由存在论根基处澄清作为现代形而上学之基本建制的“意识内在性”与马克思哲学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

性”——即葛兰西所眺望而又未能实际地展开的实践哲学的“内在性”——之间的原则差别,将成为今天我们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的一个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 [1] 葛兰西. 狱中札记 [M]. 曹雷雨, 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 [3]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 第四卷 [M]. 贺麟, 王太庆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4] 伽达默尔. 哲学解释学 [M]. 夏镇平, 宋建平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 [5] 海德格尔. 晚期海德格尔三天讨论班纪要 [J]. 丁耘摘译. 北京: 哲学译丛, 2001, (3).

责任编辑/卢云昆

(上接第15页)

黑格尔哲学的费希特因素。因此,从哲学上来说,卢卡奇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薄弱方面,首先就在于其存在论的根基——在于这一根基虽力图摆脱并阻遏依费尔巴哈定向的退行性理解路线,却仍然依赖于哲学的形而上学基地,仍然滞留于断言、反思及概念的天真性中,并且于意识的内在性贯穿一事几无意识和作为。这种情况可以在主要之点上说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激进批判如何潜在地包含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方向,而这种浪漫主义方向又如何表现出“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并接

近于“革命救世主义的唯心主义”;它还可以部分地说明,20世纪的现代性批判,特别是由卢卡奇所引导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何以会出现一种由“伟大梦想”作补充的妥协终局。至于卢卡奇后来的哲学思想,我们注意到他开始直接地关注并转向存在论(本体论),甚至开始构筑所谓“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但由于上述的天真假设始终未曾被真正意识到并从而瓦解之,所以其勤勉的构造工作不仅到处显露出纠缠与驳杂,而且事实上已陷入到严重的衰退过程中去了。

参考文献:

- [1]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 [M]. 杜章智,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 [2]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 上卷 [M]. 贺麟, 王玖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责任编辑/卢云昆

相关的具体阐释可参看吴晓明、王德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一书中的《内在性之瓦解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境域》以及《试论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等篇章。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ABSTRACTS

A Study of the Forms of Academic Organizations at Universities : Also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Academic Organizations at Yunnan University

WU Song

The forms of academic organizations at universitie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the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their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has proved that this role is somewhat denied. The causes result from numerous defects in the existing academic organization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To eradicate such defects and construct ideal forms of academic organizations is a must in the reform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The General Category of Lukacs and its Ontological Orientation of Hegelism

WU Xiao-ming

The importance of Lukacs' "general" category lies in its criticism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vulgar Marxism and points out the key approach to 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Th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general category in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is understood as methodological, it in fact leads to the depth of ontology in terms of its basic problems. In this aspect Lukacs has made uniqu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but his ontological base of the general category is still of Hegelism. His "general" category as "the essential interaction" has not made a breakthrough in the basic structure of modern metaphysics but confined itself in the categorical theory.

The "Immanence" of Gramsci's Practical Philosophy and its Ontological Limitations

JIANG You-fu

Through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nature of immanence in practical philosophy, Gramsci successfully criticized the abstract or idealistic aspects of ontology of "orthodox Marxism" and prevented the marching backwards to the "pre-Kantian philosophy"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Though Gramsci tried to use the "immanence of history or realism" to distinguish the "immanence" of practical philosophy from Hegel's "immanence of thinking", his over-praise of Ricardo and the inheritance of the form of philosophical "thinking" as well as his ontological foundation, he was unable to give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immanence".

Korsch's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its Ontological Foundation

XU Q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modern significance of Marxist philosophy is a great challenge to us. The controversies over the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by the 2nd International theorists and the early leaders of Western Marxism will help us have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its nature. Through a severe criticism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vulgar Marxism, Korsch gave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chievements, significance and limitations of Korsch's critic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tology.

Marcuse's Erotic Liberation and its Ontological Perspective

YE Xiao-lu

Starting from a trace back to the cause of alienation of modern man, Marcuse brought up "erotic liberation" based on Freud's theory on instinct and proposed a non-repressive civilization with this liberation as the core. It advocates a "new